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68

2007年9月28日

論宏觀調控必須轉軌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 王建

宏觀調控必須轉軌了。這裡所說的轉軌，是指宏觀調控思維與方式的轉軌。

必須轉軌的原因之一，
是總供求的格局與以前不同了

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總供求格局的長期態勢是需求大於供給，這種格局產生的原因是產權不明晰所導致的公共資源使用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嚴重平均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雖然引入了市場機制，但是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到產權改革，所以“短缺經濟”仍然是

常態，但造成短缺的機制有所變化，從改革前主要是由投資需求過度膨脹所導致的短缺，開始過度到投資與消費的“雙膨脹”，其原因是公有制的生產主體獲得了生產的自主權和收入分配權，而在收入分配中公有制生產主體都傾向於擴大個人收入的比重。

中國的產權改革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採取了“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改變現存公有制生產主體產權性質的基礎上，在公有制經濟的外圍鼓勵發展非公經濟成份，90 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以後，產權制度改革開始深入到公有制經濟主體的內部。隨著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入，中國的分配關係開始發生深刻變化，收入向少部分人群集中，導致儲蓄率大幅度上昇，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係數也顯著上昇。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吉尼係數只有 0.23，到 80 年代後期也不過只有 0.29，但是到 90 年代中期就超過了 0.4，最近幾年內則已經上昇到 0.46 了。

產權制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變化，必然會導致基本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變，也必然會改變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徵，就是從社會總供給小於總需求轉變為供大於求，經濟增長中的供給制約轉變成需求制約。這種轉變主要是發生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首先，在 80~90 年代初期的三次市場化經濟增長高潮中，居民消費都有“同步性”特徵，例如彩電等家用電器產品，在 80 年代中、後期僅用五年就基本普及了，然而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住宅和汽車消費顯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家庭所帶動的。在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由於主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國內供給不足，總會引發大量進口和貿易逆差，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明顯下降，但是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過程中，卻始終保持著貿易順差明顯擴大與外匯儲備猛增的趨勢。以往經濟增長高潮所導致的宏觀

緊縮，消費物價上漲總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卻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格局，2006年的CPI只有1.5%，2007年雖然再次出現了物價的較明顯上漲，但原因顯然不是由於總體消費需求的膨脹，而是因為食品供給短缺所引發的結構型通脹。在以往的經濟增長高潮中，GDP增長率上昇到10%、工業增長率上昇到20%後只能維持兩年左右時間，在本輪經濟高潮中，兩者在這個水平以上運行到目前為止，則已接近五年時間。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頸制約是常態，在經濟增長高潮到來時會更加突出，而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瓶頸雖然也出現過，但很快就被突破，例如到2005年初鋼材價格就開始下降，到2006年電力供應緊張也全面緩解，主要瓶頸部門都在兩年左右時間內，就從供應緊張轉向供求平衡，並開始出現較明顯的產能過剩了。

這些經濟運行特徵的變化，都是中國經濟的總供求格局從供小於求向供大於求轉變的反映。由於分配結構的變化，導致儲蓄傾向上昇而消費傾向下降，使投資可以獲得充足的來源，就可以迅速突破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瓶頸。由於儲蓄增長速度超過了投資增長速度，社會的剩餘產品大量增加，不僅可以充分滿足投資需求，還可以有大量產品提供出口，使投資與貿易順差增長保持“雙高速”。從另一方面看，則是消費率不斷下降，最終消費率從2000年63.8%直降到2006年的38.9%。如果沒有消費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鉅大的投資規模保持長達五年時間，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兩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亦不可能把2007年以來的非食品消費物價壓低到只有0.9%的程度。

在本輪經濟增長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也和總供求格局的改變密切相關。例如分配差距拉大導致儲蓄過剩，儲蓄過剩導致投資

高增長和不斷下降的消費率，又形成產能過剩。過剩產能在國內找不到出路只有開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斷拉大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的擴大引來了對人民幣昇值的預期又引來了國際熱錢流入，形成了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和外匯佔款項下的貨幣被動投放，又形成了貨幣流動性過剩。貨幣過剩最終導致了國內資產價格控制不住地上漲。所以，如果沒有總供求格局的改變，這些以前未見或並不嚴重的新問題是不會出現的，而這些新問題的出現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方式，又反過來證明中國的基本經濟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深刻改變。

說宏觀調控的思維與模式必須轉變，正是基於中國的基本經濟運行機制已經同計劃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同了，也和改革30年中的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同了，中國經濟運行已經全面進入到市場化運行軌道，所以宏觀調控也必須進行相應轉軌。比如市場經濟中的週期性波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分析大體是四個階段，即蕭條、復甦、繁榮與危機。導致經濟在週期中漲落的基本原因不是消費需求的波動，而是投資需求的波動。當投資需求上昇時經濟就開始復甦，達到頂點時就是進入了繁榮期，而當大量項目集中到期完工，投資需求就會突然下降，而產能同時大量釋放，此時就會使社會的總供求格局突然改變，使由投資需求主導的總需求突然減少，而總供給卻突然增加，由此形成生產嚴重過剩。所以繁榮與危機是緊密連接的兩個階段，總是在繁榮到達頂點時突然爆發危機。

然而在目前的宏觀調控中，對中國經濟運行週期的看法顯然還停留在以前的階段。比如，認為當前的經濟運行仍沒有“過熱”，而是要防止過熱。一直以來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的標準主要有三點：一是是否存在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以及較高的投

資、消費與工業增長率，如果經濟增長率接近 10%、工業增長率接近 20%、投資增長率接近 30%，一般持續兩年左右就會進行宏觀緊縮；二是是否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瓶頸制約，能源、交通與原材料等基礎部門出現了嚴重瓶頸約束，已經不能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了；三是是否存在著較明顯的物價上漲。用這三個標準來衡量，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和需求增長速度雖然都很高，但是沒有瓶頸制約，物價上漲雖然已經比較明顯，但原因顯然不是由於全面的需求膨脹，而是由於食品供給短缺所形成的結構型通脹。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按西方的所謂“核心通脹率”看，目前只有 0.9%，還有“通縮”的跡象。此外看 PPI 即生產者價格走勢，直到目前仍維持了同比走低的趨勢。由於傳統上衡量過熱的標準還沒有達到，所以對目前經濟週期所處階段的判斷，就是還沒有進入到過熱階段。

然而，我們在未來還會等來過熱出現嗎？目前無論生產資料還是消費品，都已經處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過於求的狀態了，後面即將出現的是生產能力的集中釋放，是投資需求的明顯回落。從新上項目投資增長率看，2007 年以來已經回落到 15% 左右的水平，已經看不到本輪經濟週期初始階段即 2003 年上半年 70% 以上的增長率了。投資週期進入到後期，下一階段就是投資需求的回落和產能的大量集中釋放，如果我們還用以前的週期標準來判斷未來的經濟走勢，在宏觀調控工具箱中準備的都是反過熱政策，就會犯大的錯誤。如果說經濟運行中仍有過熱階段，那就是在 2003~2004 年那段時間，在那段時間過去後，經濟運行就逐步走到繁榮期的頂點了，所以目前所處的階段是經濟的繁榮期，後面緊跟著的決不是過熱階段，而是產品全面過剩階段。對宏觀調控來說，應當準備應付的也決不是過熱，而是“過剩”了。

但是，宏觀調控在中國的具體國情與經濟制度條件下應當怎樣應付過剩的衝擊，這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因為改革前 30 年我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景，在改革以來的 30 年中也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新全球化的時代背景，是否可以使我們更有條件從容應對，西方市場國家在以往 200 年中所經歷的生產過剩危機在今天的中國是否會變形，這些我們都不知道。但只要我們深刻認識了中國宏觀調控的背景已經發生了改變，對新的經濟運行週期有一個新的、基本的認識，宏觀調控的大體方向就不會出錯。

必須轉軌的原因之二，是調控對象不同了

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國有企業是生產和投資活動的主體。1978 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企業的比重高達 78%。所以在傳統體制下，國家實施經濟調控的對象是國有企業，政府對經濟運行的控制之所以具有強大力量，原因也是由於生產與投資活動的主體是國有企業，政府不僅可以使用經濟手段來控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更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命令來控制。改革以來在很長時間內，國有企業在生產與投資活動中仍保持了很大份額，例如直到 1992~1993 年的那次經濟增長高潮中，國有部門投資仍佔了 70% 以上的份額。

但是隨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 90 年代下半期進入到產權改革階段以來，中國的經濟活動主體發生了深刻變化，到 2007 年上半年，非國有企業在投資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 72.3%，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 80.9%，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 82.9% 了。

經濟活動主體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帶來宏觀調控機制的變化，

使政府對國家經濟活動的調節從傳統計劃中的以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而國家通過市場間接調控企業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個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新型調控模式，本來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追求的目標。但是當這種轉變已經到來的時候，人們的思維方式轉換並沒有同步發生，主要表現在仍然相信政府對經濟活動具有主導力量，可以決定經濟週期的長短和操縱經濟運行的冷熱方向。比如，目前許多人都相信在國家有重大的政治與社會活動期間，政府有能力不會讓經濟冷下來。

企業對政府有信心，政府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都是好事，但如果由信心而產生了盲目性就有問題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長期歷史經驗說明，政府只能在順應經濟運行基本方向的基礎上抑制經濟週期的波動幅度，防止過冷或過熱，但是卻不可能改變經濟向下或向上運行的基本趨勢。自 1825 年在英國發生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在長達 150 多年中，西方市場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危機，每隔七、八年就會來一次。20 世紀 30 年代雖然出現了以凱恩斯為代表的西方宏觀需求調控理論與政策，也沒有有效避免過危機的週期性出現。危機的教訓如此深刻，從政府到企業和經濟理論界，已經沒有人不懂得經濟擴張過度會出現嚴重生產過剩的道理，然而危機還總是隔一段時間就如約而至，原因就在於對企業而言，投資和生產等經營活動是不可能因為存在危機的威脅就停下來的。當危機來臨的時候，當然沒有誰仍然會愚蠢地繼續擴大生產和投資，但因為誰都只看到了危機的跡象，卻誰也無法準確預測危機何時會爆發，所以大家都希望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把生產和投資的擴大維持到危機爆發前的那一刻。

所以，政府通過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活動所施加的影響力，

在千萬個企業追求利潤的強烈動機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於企業的調控政策會被順利接收，相反則會受到強烈抵制。這種情況在目前的中國經濟中也能看得到，比如自 2005 年以來政府實施了一系列關於抑制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實際結果是收效甚微，2007 年以來由於股市泡沫浮現，政府又對股市實施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但總是在很短時間內就被股市消化，所以有人針對這種情況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是“越調控、越失控”。

西方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還說明，政府對約束經濟活動的過度擴張往往辦法比較多，因為政府可以通過手中所掌握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通過收緊信貸與提高稅率來改變企業對利潤的預期，但是對促進經濟走出低谷卻沒有太多辦法，因為政府不能指令企業多借款、多投資、多生產。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只能抽緊繩子，卻不能推動繩子”。我們在中國經濟運行中也已經可以看到這種現象了。例如上屆政府為了啟動內需，曾經大量使用擴張型財政政策，2000 年政府主導到投資甚至達到當年新增投資額的 90%，但是仍沒有實現經濟的啟動，就是因為當時還沒有汽車、住宅等拉動本輪經濟增長的新需求亮點，企業不願意增加投資，所以 1999~2001 年的投資增長率只有 9.4%，其中 1999 年只有 5.1%。

以上這些說法並不是要否定政府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希望糾正那種直到今天仍認為政府無所不能的錯誤認識，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一段時間，由於國有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這種認識是有根據的，但是到了產權結構已經深刻變化的今天就是錯誤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已經需要重新審視政府對經濟的影響能力了，而只有把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擺到一個正確位置，才能實施對中國經濟的有效宏觀調控。

宏觀調控對象的變化，也應包括宏觀調控領域的變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與以往政府管理經濟的範圍完全不同的新領域，例如包括股市、債市、期貨和房地產市場在內的資本市場，以及銀行間的貨幣和外匯市場等，這些領域的出現，使政府的宏觀調控增加了許多新內容、新因素，所以必須兼顧的目標就更多了。由於這些目標之間的關係有時很複雜，有些是短期變量，有些是長期變量，這就迫使宏觀調控當局必須在看清楚這些經濟變量關係的基礎上，在多目標中經常進行有取有舍的選擇。例如政府對股市的調控目前是使用利率和稅率等手段，但效果並不明顯，主要原因就是股市狂飆賭的並不是利率和稅率這些經濟變量，而是龐大的貨幣剩餘，只要貨幣流動性過剩這個基本情況沒有發生改變，投資於股市的人就有理由相信流入股市的資金只能會更多，股指就會繼續上揚，在這個背景下，使用利率和稅率手段調控股市的做法就會失效。再比如前面所分析的情況，即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儲蓄過剩和投資過大，又引來貿易順差和貨幣流動性過剩等問題。我們現在是在抑制過剩產能、縮減貿易順差和控制流動性過剩等方面同時下手，但在源頭問題不解決的時候，這些調控措施就都是“揚湯止沸”。然而收入分配機制是一個由制度所決定的長期變量，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好的，所以如果把保經濟增長作為短期經濟運行的首要目標，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就是保增長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較高增長率的前提條件，如果通過宏觀調控改變了這些條件，貿易順差與貨幣增長率雖然降下來了，但是國內的生產過剩矛盾就必然會日趨嚴重，經濟增長就會遭遇到需求屏障而慢下來。

所以就必須進行有取有舍的選擇。我剛到國家計委的時候聽

當時的計委老領導說過一件事，在 50 年代初新中國組建國家計委的時候，曾經請前蘇聯計委主任米高楊來作指導，米高楊當時曾說過一句話，“有取有舍是戰略家，什麼都想要是小孩子”，這句話至今印象仍很深。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經濟管理尚且是如此，在今天面臨如此眾多的經濟變量的時候，國家宏觀調控更需如此。如果把經濟運行中的問題都當作需要必須解決的麻煩，分不清哪些是必須要保的目標，哪些是選擇了這個目標後所必須支付的代價，在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和各分目標之間就不可能做到“綱舉目張”，政出多門、朝令夕改的“打亂仗”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必須轉軌的原因之三， 是宏觀調控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

1978 年，進出口總額佔 GDP 的比重還不到 10%，到 2007 年上半年已經超過 70% 了，中國經濟在 30 年改革開放中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這使得中國的宏觀調控不可能關起門來進行，而是必須考慮到世界經濟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

說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必須在高度開放條件下轉軌，是因為直到目前我們似乎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宏觀調控中許多變量和工具，已經不是我們可以僅根據國內經濟發展需要隨意改變和使用的了。比如，貨幣供給量一向是中國貨幣當局根據本國的經濟增長需要安排的，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取得了鉅大的貿易優勢，出口增長長期超過進口增長，在 2000 年以來這種情況特別明顯，但是也引來了貿易順差和國際熱錢所形成的外匯儲備不斷

增加，從而導致在外匯佔款項下基礎貨幣的被動式投放。2003 年外匯佔款項下所形成的貨幣投放，第一次與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供給量相等，到 2006 年則已相當於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供給量的三倍了，從這點來說，中國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的同時，貨幣政策卻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獨立性，即基礎貨幣的增長不是依據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數量安排的，而是被動地由外匯流入量所決定的。央行雖然依據中國經濟增長對貨幣供給的實際需要，頻繁使用對沖操作收回多餘的貨幣投放，但是由於外匯流入量不可控，對沖操作往往只能滯後於被動的貨幣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的貨幣流動性過剩的格局。

中國的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更集中地表現在利率政策上。由於鉅大的貿易順差引來了鉅額國際熱錢投機於人民幣升值，但熱錢也有成本，就是熱錢所屬幣種的貸款利率水平，所以熱錢的收益等於人民幣升值幅度加人民幣存款利率再減掉熱錢所屬幣種利率後的差額。比如美元目前的基本利率是 5.25%，如果人民幣的基本利率是 3.87%，而人民幣預期在一年會升值 5%，則借入美元而投機人民幣升值的收益就是 3.62%。所以，人民幣的利率水平越高，國際熱錢的投機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來是為了抑制貨幣需求，但是人民幣利率越高，熱錢的投機風險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應導致中國央行從外匯佔款項下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加，因此加息的結果反而變成了造成貨幣供給增多的因素，正是因為這種情況，中國的利率政策就失去了獨立性。

2007 年以來央行已經進行了五次加息行動，目標是對準了資產價格上漲和投資的高速增長，以及日漸明顯的通脹勢頭，希望通過收緊銀根來達成到抑制貨幣需求的目標。但是加息的效果是首先引來的更大的國際熱錢流入，2003~2006 年，包括貿易順差與

FDI 在內的正常外匯流入平均佔同期外匯儲備增加額的 73.7%，但是 2007 年上半年卻大幅度下落到只有 54.2%，下降了近 20 個百分點，這裡面雖然有中國企業海外上市外匯收入流入的短期影響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是由於加息引來了更多國際熱錢的情況。

順便指出，目前的消費物價上漲是因為食品供給不足所形成的“結構型通脹”，而不是總需求膨脹造成的，因為加息並不能增加食品供給，所以加息就不可能抑制消費物價的上漲，而從 2003 年發端的本輪投資週期目前已進入到後期階段，沒有人會為了僅一、兩個百分點的貸款利率變化就廢棄了已經完成了 70~80% 的投資項目，所以加息也不可能抑制投資的繼續增長，而前面已經說過，對股市和房地產來說，投資的人也不是賭的利率高低，而是流動性過剩，由於加息反而使流動性過剩更加嚴重，所以加息就在以上三個方面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

利率政策一向被認為是政府進行宏觀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變動對宏觀需求的影響力在中國發生了逆轉，從未來趨勢看，由於利率政策將越來越難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所以在中國特定歷史階段的宏觀調控手段使用中，將會越來越被“邊緣化”。使用正回購手段對沖，由於央行手裡的債券等對沖工具數量終究有限，有很大局限性，用“央票”對沖由於央行必須有借有還，必然導致央票越發越多，也不是長久之計，那麼是否在中國會出現世界各國前所未有的高存款準備金率呢？如果是這樣又會有什麼問題？還有沒有其他好辦法？這些問題都需要立足於外部條件的長期變化，從現在起就開始認真研究，尋找到新的宏觀調控辦法，而不能走到哪算哪。

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的貨幣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在某種程

度上不能獨立，只會是短期的事情，這種判斷仍然是對中國經濟外部條件的變化缺乏清醒認識。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主要是承接了發達國家消費類產業的轉移，由於發展中國家至今仍具有相比於發達國家低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內的相對要素價格增長率，拉平這個差距恐怕還要20~30年，所以發達國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也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動力所在。而在發達國家的製造業結構中，消費類產業只佔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也就是說，發達國家製造業中的主體到目前還基本沒有向發展中國家移動，從中國的貿易結構看，雖然中國的機電產品貿易從2001年開始就出現了持續的貿易順差，但直到當前還是在大量從發達國家進口高端的技術裝備，而化工產品直到目前也還是貿易逆差。這說明中國目前還是在製造業技術水平方面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也是發達國家的重工業難以向中國大規模轉移的原因。但是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中國的製造業裝備水平通過引進和自主創新，已經開始迎頭趕了上來，以製造業的核心數控機床為例，2000年中國數控機床產量剛剛突破一萬臺，2007年則將邁過十萬臺的高峰，而且長期受發達國家封鎖的五軸聯動數控機床也取得了重大技術突破，可以成批量生產了。加上每年進口的20萬臺數控機床，中國機床的數控化率正以每年五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提昇，2007年將超過40%，到2010年就可以達到發達國家60%的平均水平了。所以用不了太長時間，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重化工產業的高潮，中國也將逐步成為向世界提供汽車、飛機、成套高端工業技術裝備和化工產品等重工產品的大國。所以，隨著新全球化過程的深入，更大的國際產業轉移浪潮還在後面，而隨著這個浪潮的興起，中國的貿易順差會增長得比目前

更迅速。我做過一個簡單的測算，如果發達國家的重工業會轉移出 60% 的產出份額，而其中的 60% 又是轉移到中國，則中國的出口額到 2030 年可能會達到五萬億美元，年均貿易順差可能會達到超過 3000 億美元，國際直接投資可能會達到每年 1000 億美元，累積的外匯儲備按目前的情況計算可能會達到 20 萬億美元。

除非中國不願意像已經過去的 30 年那樣，接受這個新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否則由貿易順差與國際直接投資以及引來的相關熱錢的增加，就會在未來長期內使貨幣流動性過剩成為常態，這就是中國為了獲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成本或代價。當然我們也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的智慧，在新時代創造出與之相對應的新宏觀調控理論與方法，但前提是宏觀調控的思維與方法必須轉軌。

說宏觀調控思維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外部環境而改變，也包括如何利用中國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優勢，去主動影響國際經濟波動，以形成有利於中國的短期與長期態勢。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資源消費大國，一般而言，在某種國際初級產品交易中佔有了 10% 的份額，就可以對這個產品產生定價權，但是我們目前在有色金屬、鋼鐵和石油等產品的國際貿易中已經開始接近甚至大大超過了 10% 的比重，定價權卻仍然操縱在別人手裡。2006 年全球最大的 IPO 是中國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工商銀行，到 2007 年 7 月中國股市規模已經超過了東京股市，年初以來，中國股市的漲跌也開始對國際股市行情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我們應怎樣利用這些新優勢來通過中國的短期宏觀調控和長期戰略選擇，在國際經濟中牟取中國的利益，也似乎還沒有破題。當然，中國作為一個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新出現的大國，形成美國那樣的全球經濟思維模式還需要一段時間，這也就顯出了宏觀調控思維轉軌的必要性。

最後，宏觀調控思維與方式的轉軌， 還應包括方法的轉軌

以統計數據來說，目前我們只有國家統計局一套指標體系，在中國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由於地方政府的利益往往與中央政府不一致，所以從基層逐級上報得到的統計數據往往就不真實，還有許多數據例如物價指標，也往往被指與人們的實際感受不一致。

在發達國家，不僅有政府的統計體系，也有許多民間機構的統計體系，也在進行統計指標的採集與分析，並進行定期發佈。例如，在美國就有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美國大企業協會和美國經濟週期研究所公佈的經濟領先、同步與滯後指數；美國芝加哥供應與管理協會公佈的美國採購經理人指數；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協會公佈的抵押貸款申請指數；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公佈的美國房屋營建商信心指數；美國道瓊斯－三菱東京 UFJ 銀行公佈的商業景氣指數等等。這些民間研究機構的統計指標和分析，都可以大大豐富人們對經濟運行認識的視野和深度，不論對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是對民間的企業決策，都是有益的幫助。所以在宏觀調控轉軌的內容中，就應當有鼓勵民間統計指標體系發育的政策。

經濟發展是一條歷史的長河，推動經濟運行發生短期波動的重大因素，也往往決定著長期波動與結構變動的方向，許多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影響因素，往往是在引起某些重大短期波動以前的很長時間裡就開始醞釀了，只是需要一個量變到質變的積累過程，在引發短期劇烈波動之前會長期潛伏而不被人們所重

視。

例如，中國是人均耕地資源極度稀缺的國家，由於人口還沒有增長到高峰，對食品的需求在到達人口高峰前肯定會隨著人口增長而增加，此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也會提昇食品消費的絕對水平，這就要求在農業生產技術水平沒有重大變化的條件下，必須保有足夠的耕地來保障足夠的農業產出量。但是由於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也需要佔用大量耕地，這就會在保持農業產出水平與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建設之間產生尖銳矛盾。在農業生產力和農村經濟體制尚能提供較大產出空間的時候，這個矛盾還並不突出，但是1998年到達糧食產出高峰後，近十年糧食單產水平沒有顯著提高，耕地佔用規模卻不斷增加，因此雖然自2004年以來農業出現了連續三年大豐收，可糧食的總產量卻仍沒有恢復到1998年的歷史最高點。耕地不斷減少而糧食消費量卻不斷增加，這個由國情決定的長期背景因素遲早會導致食品價格的長期上漲趨勢，從而成為推動中國CPI長期走高的基本動力。從這點看，自2006年四季度以來出現的由於食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結構型通脹，是一個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必然會出現的事情，我們如果對這個長期因素有了深刻認識，就不會在短期價格波動出現後感到摸不著頭腦，在導致物價上漲的原因上面爭論不休，在結構型通脹面前，以總量調控措施來應對。

因此，由於決定短期經濟波動因素與決定長期趨勢的因素密不可分，要想提高短期的宏觀調控效率，就必須加強對長期發展戰略問題的研究，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對許多短期經濟波動的出現才能未雨綢繆，臨變不驚，從容應對。

以上這些看法不見得正確，說出來就願為引玉之磚。